

长征人 话长征



目 录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	萧 克(1)
巧取陈家寨	胡世春(15)
孤军突围	彭湘臣(23)
突破澧水	刘转连(32)
跟随贺龙长征	肖庆云(41)
不是亲人 胜似亲人	彭绍先(57)
侦察兵巧渡鸭池河	王绍南(70)
唤醒沉睡的山城	左 齐(77)
救国救民的“王者之师”	谭友林(82)
归 队	熊 晃(90)
苗汉一家亲	谢中光(98)
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刘转连(107)
掩护大部队渡江	郭 鹏(116)
牵着牛鼻子推磨	朱家胜(126)
声东击西巧转兵	杨秀山(136)
开路先锋	黄新廷(145)
八千里路云和月	左 齐(155)

金沙江夜渡记	周其友	(165)
六月雪	田国浩	(170)
爬雪山	李桂林	(174)
救活七位战友	肖新书	(177)
艰难的时刻	颜金生	(180)
情暖苗家藏家	杨宗胜	(186)
一次特别的支委会	钱治安	(195)
喇嘛头和鸡毛信	何 辉	(199)
贺龙和红小鬼	周昌举	(211)
永难忘却的记忆	蹇先任	(221)
铁脚板走遍万水千山	廖汉生	(228)
到甘孜会师去	谭尚维	(238)
危难时刻见真情	许义华	(246)
最后的脚印	李文清	(254)
草地见闻录	颜金生	(264)
飘动的篝火	朱家胜	(282)
红军第二军团第六军团长征时的组织序列		(287)
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时的组织序列之一		(288)
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时的组织序列之二		(290)
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时的组织序列之三		(291)
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时的组织序列之四		(292)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

萧 克

声东击西 迷惑敌人

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主动地、有计划地进行的，不是流寇式的单纯军事行动，也不是搬家式的消极逃跑。我们吸取中央红军及六军团自己的经验教训，退出时行李简化，只带一两天米，轻装前进。只要是有胜利的把握，就坚决勇敢地打仗。打好仗，就可以休整（多则十天半月，少则也三两天），就可以扩大红军。

我们的运动方向是向西。为了迷惑敌人，则故意向东南，也就是古代兵法讲的“声东击西”。我们从桑植出发，走两天到大庸县城东三十里之兴隆街地区，乘夜突破了由敌十九师李觉部防守的澧水防线。再向南急行军两天，到沅江北岸之洞庭溪，突破了沅江防线，全歼敌

一个营。继续向东南猛进，一下子插进湘中很富裕、人口很稠密的地区新化、锡矿山、辰溪、溆浦。经过十多天工作，才真向西走，到芷江、晃县之间的便水，与追敌十六师、十九师全部及六十三师之一部大战了一场。这一仗虽然是个消耗战，但制止了敌人的急追，取得了在江口和石阡的短时休整，并迎回了我主力由湘鄂川黔苏区出发时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部队——六军团第十八师之五十三团及地方武装。他们在强敌围攻下，不能立足，由师长张振坤同志（抗战时在新四军皖南事变中牺牲）率领，从苏区西面突围，采取迂回曲折、避实击虚的战术，突破敌人重重包围，几经艰苦，经招头寨、黔江、酉阳、秀山、松桃一带，到江口与主力会合，全军为之庆幸。

我军在江口、石阡及以南地区稍事休整，即经余庆、瓮安、平越，进至贵阳北六十里之札佐镇，歼守敌两个营，约一千人；又经修文西渡鸭池河，占领黔西、大定（大方）、毕节地区。敌万耀煌部十三师追来，占了大定。我十七师由遵义西之打鼓新场（现设金沙县）游击，遂回师大定，在大定城西十余里之将军山，将敌向毕节进攻之先头部队七个连四面包围。经一小时半就解决了战斗，无一漏网，制止了敌之急追。我军控制将军山，形成在毕节、大定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活动的东西屏障。尔后，两军团与强大的追敌激战，并对驻威宁之滇军严加警戒。同时积极开展了地方工作，使后方机关及伤病人员也得到休整。近二十天，补充新兵五千人。

这时敌军越来越多，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郭

汝栋等四个纵队，共七个师一个旅，向毕节地区进犯。当时地方工作一时也不能广泛和深入开展，遂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下旬退出毕节城，进入乌蒙山区活动。敌又以十个师继续围攻，长江北岸又有大批川军防堵，我们就决定跳出敌人包围圈，从昭通、威宁之间，穿过滇军孙渡纵队防线，向南直趋滇东，占领宣威、亦资孔及贵州之盘县，进至南北盘江之间。这时追敌由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的九十个团，只剩下五十多个团了。我则兵员充实（不减于从湘鄂川黔边出发的入数），士气旺盛，南北盘江及牛栏江东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条件都比较有利。贺、任、关为首的军委分会，决定在这一带展开创立游击根据地的活动。这是我们在长征中第三次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意图。

发动群众 壮大力量

还在我们从湘鄂川黔快出发的时候，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对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又接到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国际和中央这些精神，我们认为切合中国当时政治形势的要求。南渡澧水后，夏曦同志起草了抗日反蒋的六言韵文布告，用六军团政治部名义发出。这是一个好的布告，原文记不全了，但前后几句话我还记得，前面几句是：“我们工农红军，志在救国救民，实行抗日反蒋，消灭卖国巨寇。”末尾两句是：“大家起来救国，胜利终归我们。”我们边走边打边宣传，

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六军团到新化，号召凡属愿意打日本的，我们都欢迎。许多群众踊跃参军，只七天就来了千人。新化东六十里之锡矿山，是个有机器设备而规模不小的矿区。王震同志带十六师去游击，只三四天，也有二三百人来参军。这是六军团从湘赣苏区活动以来吸收现代产业工人最多的一次。二军团占领溆浦、辰溪、浦市广大地区后，广为宣传，发动群众，没收、分配豪绅地主的财物，人民对红军的行动及其政治性，有了较好的认识，不过十天，参军的约二千人。这样，一路宣传抗日救国和打倒蒋介石的道理，对国民党统治区的震动很大。敌人千方百计地要消灭我们，前堵后追，不断空袭；我们则千方百计地保存自己，扩大自己，消灭敌人。我们在湘中活动一个短时间，就转向西南。敌人妄想利用湘西和黔东险峻山岳地带，构筑封锁线，阻我西行。我军打破敌人多处关隘，突破了敌人层层封锁。特别在黔东、石阡以西地区，突破敌二十三师守备的四十里纵深的碉堡封锁后，甩掉了新围拢来的敌人重兵集团，全军经湘西，横贯贵州，渡过干坝河，逼近贵阳，又渡鸭池河，占领黔西、大定、毕节。走了不少路，打了不少仗，队伍却没有减少。为什么呢？就是一路宣传抗日救国和红军纪律，做群众工作，打土豪、分财物，得到广大群众拥护。

根据中央统一战线的指示，在石阡休整时，我们在天主教堂召开了一次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由弼时同志作了扩大统一战线的报告，对统一全体指战员的思想起了

很大的作用。所以，路上我们很注意做统一战线工作，六军团由夏曦同志直接主持。他在新化，不仅注意工农的工作，而且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妇女中的工作，都有成效。在毕节，还注意团结开明士绅。如毕节旧知识分子和高级开明士绅周素园，是清朝末年的秀才，到贵阳办报，后来又在北洋政府供职，在袁祖铭部当过秘书长。我们快到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叫他走，他说：“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我们到后，到他家发现有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翻开一看，圈圈点点。政工人员立即把这种情况告诉王震和夏曦同志。他们马上去找他，问过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看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他们又问：“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要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他说：“赞成，完全赞成。”我们就请他出来号召，当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时间很短就发展到一千人枪。我们到毕节前，原来想在黔西、大定站住脚，到毕节后，情他给云南的国民党纵队司令孙渡写信。因为他和龙云、孙渡等上层人物都认识，他就把共产党和红军当时的政治主张告知孙，并说：蒋介石派中央嫡系万耀煌、樊嵩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便你把红军打掉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挟天予以令诸侯，人多势大，那时的云南，还是你的？！假道灭虢，史有明鉴。正是由于龙云当时的处

境，周素园给孙渡写信，打中了他的要害。所以孙渡就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形成与国民党追击军造成夹击之势，迫我北走四川。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东面来的敌人，能在毕节停留近二十天，休整补充。

直奔甘孜 会合战友

红二、六军团从乌蒙山地区分途到达宣威和盘县。在盘县时，接到总司令部的电报，署名是朱德总司令和当时的总政委张国焘，要我们西行渡金沙江，到西康同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抗日。这时我们对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张国焘闹分裂反中央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当时我们还想在滇黔边站住脚。虽然查明来包围这地区的敌人比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少多了，但也还在五十个团以上。时间久了，敌情也可以变化，是否能站得住，是个未知数。总司令部要我们北上抗日，我们从当时整个的国内形势来看，认为北上抗日是大势所趋。经军分会的考虑，决定执行总司令部的指示，与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

我们在南北盘江搞根据地的架势，敌人也看出来了，就布置新的围攻。贺龙同志为首的军分会（军分会受双重领导，即中央军委和省委）就决定经滇中到金沙江上游渡江。我军已拉开了在南北盘江站稳脚的架势，突然来个向西，就摆脱了强大敌人的追击。但进到昆明北面百余里准备渡过普渡河的时候，遇到强大的滇军的堵截，

打了个恶战，西渡未成。我们就从普渡河向南，转向昆明附近，又摆出一副“攻其所必救”的架势，打个圈子转到昆明以西，继续西进，就把堵截的滇军主力甩到后面了。从此，虽然后有追兵，但前无堵截，行动就主动得多了。由于云南敌人对我们有个错误的判断，说红军没有炮，打不了碉堡、城市，在我军接近云南的时候，令各县迅速构筑碉堡，修理城垣，把各县重要物资运存于碉堡和城市之中，由各地民警团队守备。但这些团队训练不良，我们分两路前进，先头部队猛打猛冲，攻占禄丰、楚雄、盐兴、姚安、祥云、宾川、鹤庆、丽江等数城和无数碉堡，吃的穿的，无所不有。从盘县东进才二十三天，就到了金沙江江畔的丽江县的石鼓等地，渡过金沙江。

当中央红军在一九三五年要过大渡河的时候，蒋介石在昆明亲自部署大渡河地区的会战。电令所属，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没之地，红军进入彝汉杂处、山川阻隔和地形险峻的绝地，粮食困难，必蹈石达开之覆辙，要他的部属不失时机，建立“功勋”云云。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御用的一些历史家们，也学着蒋介石的滥调，大放厥词。然而，红军的胜利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宣告了他们唯心史观的破产。所以，在二、六军团快渡金沙江的时候，他们噤若寒蝉，再不敢作愚蠢的预言了。只有独夫民贼蒋介石以无可奈何的心情，带着云南土皇帝龙云，乘坐帝国主义赏赐的飞机，在金沙江南的鹤庆、宾川、丽江一带上空，没精打采地盘旋，作

一番“黔驴技穷”的表演而已。我们过江后，云南军队虽然跟上来了，但到了金沙江边也望江兴叹了。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后，李伯钊等同志演了一个戏，叫《破草鞋》（黄镇同志在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编剧），说敌人追到金沙江边，只捡到红军丢下的一只破草鞋，就收兵了。这是一出有政治意义的生动的讽刺剧，说敌人一无所得，红军胜利北上了。当时，我们看了这场戏都很高兴，直到现在，仍有深刻的印象。

在长征途中，我们虽然消耗很大，但补充也很多。过金沙江，我们还有一万八千人。渡金沙江后，翻过大雪山，四月三十日，到达中甸，进入藏民区，分两纵队向甘孜前进。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得荣、巴安、白玉，于六月三十日，在绒坝岔与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会合。六军团为右纵队，经定乡、稻城、理化、瞻化，于六月二十二日到甘孜之蒲玉隆与四方而军总指挥部会合，见到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张国焘和总司令部人员及四方面军一部分高级干部。

七月二日，二、六军团齐聚于甘孜，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五日，按照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二方面军（将三十二军编入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我为副总指挥。从此，我们就用二方面军的番号了。

我们虽然和四方面军同志初次见面，但亲如兄弟，一种阶级的情感，体现在双方的容颜举止之中。四方而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虽去前方，但对两军团结非常关心。他

在会合之前恳切地同其他领导人说，去年我们和一方面军没有搞好，现在二、六军团来了，一定要搞好啊！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认真执行了徐向前同志的这个指示。当我们到蒲玉隆那天，后面有近百人掉队，四方面军立即派马数十匹去接回来。给我们大部分同志打了毛背心，还从理化和瞻化、甘孜送牛羊给我们。

战天斗地 克服困难

长征途中，我们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战胜了无数艰险，部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士气。在草地行军中，最大的困难是两个。一是自然条件的障碍，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雪山草地。我们绝大多数是湘、赣、江汉平原和贵州人，一下进入青藏高原，海拔在三千至五六千米，即便在一般盆地也不容易适应。我们去甘孜路上，都要翻雪山，左路二军团要翻两个海拔四千米和两个五千米的雪山。六军团也要翻瓮水、那坡两座大雪山，还要通过四个小雪山。大雪山上，终年积雪，气候严寒，瞬息万变。有时天晴气朗，有时漫天大雪，空气稀薄，呼吸困难。如不奋勇前进，停止或休息，就有死亡的危险。从甘孜往北，向哈达铺前进，沿途大部分是广漠的草地。这里同样地势很高，空气稀薄，正值夏秋之交，几乎每天下雨，草深地湿。我们雨具不足，帐篷不够，露营不得安息。除了同天斗、同地斗，有时还要同动物斗。我们露营，通常把马拴在帐

篷外。一次，有个单位天亮后发现少了一匹马，大家都奇怪，哪里去了？就派人去找，快到中午，在离宿营地四五里的山梁上，看到几十个猴子，有些拉马缰绳，有些骑在马上。我们打了几枪，猴子跑了，才牵回马来。这在草地行军虽然是稀有的例子，可见与自然界斗争的严重性。第二个大问题是粮食缺乏。在到甘孜之前，虽然感到粮食有困难，但西康南面人口不少，我们执行民族政策，得到藏民的帮助，比较好地解决了。但从甘孜向北以后，草地人烟稀少，即便有些村落甚至村落较密的居民区，但农业不发达，群众主要以畜牧为生。反动土司，常常把牛羊赶走。四方面军大队前面走，对后面虽然有照顾，也是杯水车薪（四方面军自己也很困难）。部队因粮少疲劳，体力下降，由这一段到那一段（多为二三百里至四五百里），虽然努力准备粮食，常常不能完成行军计划。我们的口号是：“走出草地，就是胜利。”动员全体同志节约粮食，规定每人的最低量，然而有时也难乎为继，就吃野菜野果，煮牛皮、牛羊骨汤喝。部队体力不断削弱，生病掉队增多，有些同志有时失脚一倒或坐下，就不能再起来。他们为了党的抗日救国路线，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在祖国大地上光荣地为国捐躯了。

除了前述两个大困难外，还要向反动土司的骑兵作斗争。人们通常的印象，以为草地行军除了同自然作斗争外，没有敌情顾虑了。其实不然，同反动骑兵作斗争，也不是小问题。四方面军在草地有经验，组织了骑兵师，各军、师也有小骑兵部队。二方面军马少，也不

懂骑术。侦察警戒，总得要求有一定的速度，所以也在军部、师部组织了少量骑兵侦察员、通讯员。对同反动骑兵作斗争问题，我们初到甘孜是没有认识的。有一天，我们到甘孜总司令部，朱德同志在一个会议上就明确指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指定刘伯承同志教我们打骑兵的战术。伯承同志来二方面军，向干部讲述了打骑兵及草地行军注意事项，这是他以自己丰富的军事学识和作战经验向我们第一次直接传授。由于有对抗骑兵的精神准备和战术教育，在遭到骑兵几次袭扰中，虽然不能消灭他们，但我们也没有吃亏。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奋斗，终于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走出了草地，胜利地到达了岷县的哈达铺。

排除干扰 胜利会师

这时，全国红军三大主力都进至陕甘地区。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对驻陕甘的国民党东北军及西北军，由于中央政策的正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直接进行工作，影响更大，实际上他们近于停战状态。在这极为有利的形势下，蒋介石十分恐慌，一方面加紧解决两广事件，准备把胡宗南部由湖南迅速调到陕甘；另一方面则命令位于定西和武山地区的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和位于天水、秦安和武都地区的第三军王均部，阻止红军会合；同时，阴谋撤换张学良，强迫东北军和西北军执行他的“剿共”计划，进攻红军。

在这样重要的紧急关头，中革军委于九月拟定了一个战略计划，要求：一方面军西出并南下，占领西兰大道以北海原、固原地区；二、四方面军兵分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占领岷县、武山等地区，继续向东向北，会同一方面军向定西、陕西及西兰大道进攻，吸引毛炳文部；二方面军为右路，东出甘南和陕西省西南部，配合一、四方面军消灭毛炳文部，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并准备打击和消灭胡宗南部，进而逼蒋妥协，促进全国的抗日战争。但张国焘继续执行逃跑主义路线，按兵不动。结果，毛炳文部没有消灭，两广事件已经解决，胡宗南先头部队已调到了西北地区。这时，中革军委为了掌握先机，争取主动。九月十八日，又提出了集中三个方面军在静宁、会宁地区打击胡宗南部的作战方案，要求二方面军在甘南和陕南积极活动，牵制和侧击胡宗南部队，先敌北进，占领静宁、会宁、隆德、定西，以配合控制西兰大道的四方面军和同南下的一方面军，夹击胡宗南部队的行动。

静、会战役计划下发后，我二方面军对于三个方面军战略行动的统一，感到极大的欢欣，随即投入战役准备。当时，二方面军领导人还向中央发了电报，表示：“静、会战役不独是适合当前的政治、军事需要之正确决定，且是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合，三个方面军在军事上能得到统一集中领导之正确决定……党内统一团结自可随之解决。这是党与中国革命事业最可喜幸之条件。”为了执行静、会战役计划，二方面军即决定六军团

进到宝鸡地区，牵敌西进，策应一、四方面军作战（当时四方面军的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同志生病，为了不间断指挥，朱德同志派我接替他）。但张国焘反对静、会战役计划，星夜跑到前方，以家长方式命令部队自通渭、渭源、漳县地区向西撤，渡黄河，准备经青海、西宁大道翻祁连山进入甘肃西部。这时，朱德同志从后方赶到漳县之三十里铺，在西北局会议上，坚持北上。但并未能使张国焘转变，部队仍继续西撤，进至临潭。干部战士听说还要过草地，极为不满。如九军军长孙玉清同志这样的高级干部就愤愤地说：天天向太阳落去的地方走！不少人甚至离队，消极抵抗。朱德同志又在临潭西北局会议上，详说四方面军不应西进，而应北进的理由。徐向前同志语重心长地说：鄂豫皖来的老同志也不愿向西走了……他和陈昌浩、傅钟、李卓然等同志还有我都起来拥护朱总的意见。张国焘无可奈何，才同意部队回头。但因部队拉来拉去，耽搁时间，以致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部均靠拢起来。鉴于敌情严重，二方面军单独留在甘南有被敌隔断、各个击破的危险。于是，经请示中央同意，于十月四日向北转移。这样，全军人员克服极大的困难，艰苦奋战，终于夺路前进，渡过渭河，通过西兰大道，继一、四方面军于十月八日在会宁会师之后，于十月二十二日，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同一方面军也胜利地会师了。

至此，我们完成了伟大的长征任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全国三大主力红军在陕甘宁的大会合。“长征

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①。这就是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千百万人民创造的历史，红军创造的历史。

编者注：

本文节选自《红军长征·回忆史料》(2)，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标题及文内标题为编者所加。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 1967 年 11 月横排本，第 136 页。